

大学生“代经济”消费异化样态的生成逻辑及教育对策

李光明,董燕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大学生通过“代经济”消费获得一定“自由解放”的同时,也在其消费动机、消费内容、消费过程、消费关系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异化样态。究其产生逻辑,主要是工具理性扩张致使劳动价值认知功利化和去意义化、教育评价偏差催生长目标窄化和去过程化、时间焦虑引发校园生活快餐化和内卷化、过往成长历程造成内心世界空心化和泛娱乐化、数字生活方式促使人际交往虚拟化与原子化。因此,高校应从提升学生生活劳动素养、优化过程性教育评价机制、改善教育时间秩序、推动家校社联动共育学生奋斗品格、增强学生人情情感联结等方面综合施策,矫治大学生“代经济”消费的异化样态,为其自由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代经济;大学生;消费;异化样态

[中图分类号] G645.5;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7-0046-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7.015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代经济”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让人期待毫不费力即可获得理想商品和周到服务。大学生同样参与着种种“代经济”消费,手机叫外卖、代取快递、代洗衣物……早已司空见惯,甚至替课、代做作业、代写论文、代跑步等校园现象也屡见不鲜。“代经济”是把双刃剑,大学生在其消费过程中获得一定“自由解放”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异化风险,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身心成长和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力求全面审视大学生在“代经济”消费中的异化样态,并深刻剖析其逻辑成因,以探寻高校应对之策。

一、“代经济”消费对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应然价值

(一)“代经济”消费的内涵及本质

所谓“代经济”,又称“懒人经济”或“网宅经济”,指在网络平台的支持下,个人或组织建立雇佣关系、实施雇佣服务并完成服务交易的一种经济模式。在这一经济模式下,消费者提出个性化劳动替代服务需求、获得定制化代劳服务,并为此支付一定酬金。因此,“代经济”消费是指消费者以一定的酬金为代价,借助网络平台将自己不愿或不能处理的事务外包于他人或机构,从而实现个人事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简言之,“代经济”消费就是个人或组织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劳动替代服务的活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寻求劳务替代已逐渐成为人们处理日常事务方式的重要选项,让消费者获得更多自由解放的可能,也表达着对自我美好生活的理解和选择。

(二)“代经济”消费对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应然价值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目标指向,大学生的“代经济”消费概莫能外。基于此,可将大学生“代经济”消费的应然价值概括为:第一,为个人发展高阶能力创造空间。大学生可以有意识地将部分重复性、繁琐性的事务交由他人代劳,从而获得更多的时间精力以满足复杂问题探究、社会实践、深度阅读、情感交往、艺术创作等高阶能力发展的需要。第二,

为疏解身心困扰提供弹性支撑。“代经济”的出现,可以让大学生借助代劳服务暂时弥补受限条件和应对繁琐事务,一定程度上缓解身心困乏状态。第三,为拓展成长边界提供专业支持。“代经济”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调动更多资源,以更加便捷、专业的服务帮助大学生弥补能力匮乏、降低尝试门槛,进而为他们拓宽成长边界助力赋能。

二、大学生“代经济”消费的异化样态

消费异化是个体为了追逐不合理欲求而使得消费活动背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甚至成为束缚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当前大学生虽然通过“代经济”消费而获得更多的便捷服务和自由时间精力,但无可否认,也在“代经济”消费的动机、内容、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偏离甚至背离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化样态。

(一)消费动机趋向懒动求逸与利益竞逐

大学生选择“代经济”消费的动机具有多元性,主要可分为求逸和求利两个方面。诚然,“逸”和“利”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但过度执着于此或局限于此,人的发展则会陷入片面状态,甚至遭受控制和反噬。一方面,因懒惰求逸而寻求事务代劳。不少大学生自小习惯于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进入大学后仍然缺乏独立处理生活事务的自主性。加之部分大学生沉迷娱乐,一进宿舍便瘫坐在椅子上,有事下单跑腿服务,不愿在日常事务上花费时间精力。长此以往,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他人代劳服务,自己却“除了关心他自己的活着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人完全被囚禁在他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甚至无法让自己超越或摆脱自身机能的循环运作”。另一方面,因利益竞逐而寻求事务代劳。面对竞争压力,不少大学生为了谋求更优秀的学习成绩、更多样的考证考级、更亮眼的荣誉奖项,一进大学就开启了单向度的快节奏生活。他们经常来不及、也顾不上料理自己的生活事务,甚至连理应独立完成的一些学习任务也会按照个人的利害性判断和意义感体验而作出取舍,将那些自认为缺乏价值的事务花钱请人代劳。如此一来,他们的丰富生活不断被计算

收稿日期:2026-4-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大学生‘代经济’消费异化样态的生成逻辑与应对策略探究”(项目编号:21GXSZ056YB)、浙江省高等学校国内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新形势下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空间与发展理路探究”(项目编号:FX2019092)、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在浙大学生‘代经济’消费异化样态的生成逻辑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Y202044016)、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数字化生存语境下大学生时间焦虑的生成机理及教育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5S08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光明(1983—),男,山东新泰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教育研究。

主义遮蔽,自己也逐渐沦为利益角逐的单向度“器物”。

(二)消费内容侵蚀成长空间与伦理边界

大学生“代经济”消费内容的异化,主要体现于部分事务代劳对个体成长和公共伦理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侵蚀个人成长空间。大学生本应通过“代经济”消费节省出一定的可支配时间和精力,从而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事与愿违,不少大学生反而将其当作肆意挥霍和享乐的资本,使自我放逐有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被代劳的事务远非全如大学生认知的那般无意义和低价值,很多事务貌似繁琐无趣但实则富含深刻价值,表面看来无用而实为大用。若大学生习惯于将其外包给他人代劳,极有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尴尬境地:日常繁琐事不想亲为,高难任务不能亲为,紧急事务无暇亲为……以至于学习机会不断丢失,成长空间屡遭压缩。另一方面,僭越公共伦理边界。为了实现坐享其成的“躺赢”目的,有的学生频频花钱找人代做作业、代考试、代上课、代跑步打卡、代写活动方案、代测试实验数据。显然,他们为了眼前利益而谋求“外挂”助力,与以往“找枪手”作弊并无实质性区别,既违背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更偏离个人成长成才的本然目的,对个人身心健康和公平教育生态产生严重冲击。

(三)消费过程呈现主体悬置与意义抽离的特征

消费本应是一种主体有意识、有目的、介入现实并塑造自我与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不少大学生却在“代经济”消费中丢失其主体性和意义性。一方面,主体悬置。很多大学生寻求代劳服务虽表面是个人的自发选择,但实际却源自被动适应外部力量规制下的“虚假需求”。这些消费需求往往内含一定的被动性,既有来自社会压力、家庭期待、学校规约、朋辈影响等的无奈选择,也有源于大众文化规制和网络技术操纵的主动顺从。此外,在此消费过程中,大学生将自身的实践权与体验权让渡给代劳者,而自己则从“实践者”退化为“发包方”和“验收员”,主体能动作用随之被悬置于虚化状态。另一方面,意义抽离。大学生在“代经济”消费中将事务处理过程交由他人完成,自己获得的只是结果。而实践之于人的意义蕴藏于实践活动的过程之中。大学生若随意将本该个人独立完成的事务交由他人代劳,不但会弱化其责任意识、劳动精神和自强意志,而且也会将只有亲身实践才会获得的丰盈生命体验一并抽离。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操劳”是人与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的方式。大学生通过“代经济”消费而逃避本该亲力亲为的事务,无疑会弱化他们与世界的责任纽带,丢失由情感磨合、分工协调而产生的“共处伦理”机会。

(四)消费关系加剧情感物化与人际疏离

大学生在“代经济”消费中形成特定的消费关系,并随之确立起一种以市场逻辑为核心的事务应对模式。显然,这种模式不但有悖于高校教育目的,更对本该充满温情的校园人际氛围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催生情感物化。习惯于“代经济”消费的大学生,在遇见困难时也往往首选找人代劳,用自认为合算的经济代价处理问题,以免因求助他人而背负“情感债务”或丧失“心理优越感”。他们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市场交易思维不断扩张至其他校园生活领域,利益交换成为主导逻辑,而同学间那些诚挚情感联结在理性计算下被系统性消解甚至剥离。另一方面,加剧人际疏离。“代经济”消费以其便捷的事务处理优势使得本就习惯于“浅交往”的大学生如获至宝,毫不费力即可获得周到服务。如此一来,他们便可各过各的校园生活,基本不再需要周围同学的关心和帮助。殊不知,情感联结往往是在互助帮扶合作中建立起来的。当下大学生的代劳服务消费方式恰恰挤占了同学间互助合作的机会,导致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越来越稀少,情感

关系联结不断弱化。此外,个别学生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将部分任务外包于他人替代,破坏了公平竞争生态,使得人际关系越发紧张和淡漠。

三、大学生“代经济”消费异化样态的生成逻辑

(一)工具理性扩张致使大学生劳动价值认知的功利化和去意义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以效用最大化为追求的工具理性不断膨胀,甚至成为统治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价值原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和价值认知。受此影响,大学生对劳动价值的认知和判断也紧紧遵循“实用性”原则,将劳动价值与即时回报直接挂钩,把即时回报多少作为是否参加劳动以及付出努力程度的首要标准。诚然,劳动付出与收获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付出不可能不期待收获,但收获也并非必然是显性收益和即时(直接)效用,而往往那些潜移默化的、利在未来的回报才更持久、更深刻。然而,大学生在看待劳动价值时更加注重其功利性,考量能否对学业成绩、考证考级、评优评奖等高利害事项带来明显效益。依次逻辑,日常生活劳务和精神涵养类活动在他们价值序列里被边缘化,甚至变得可有可无。正因如此,大学生在面对诸多事务时,那些自认为无意义和低价值的事项就成为最先被放弃、搁置的,也是最可能被外包于他人代劳的。

(二)教育评价偏差催生大学生成长目标的窄化和去过程化

在功绩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下,高校也被卷入绩效至上的发展逻辑,其教育评价制度紧紧遵循结果导向,将各种量化指标纳入核心考核范畴。诚然,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制度为育人活动设定了清晰的标准,但同时也使得大学生将自我成长目标不断窄化和去过程化,进而将他们引至“代经济”消费的异化境地。一方面,大学生在片面的教育评价导向下不断将成长目标窄化为绩点、排名、获奖、考证等核心量化指标,而对其他事项则缺乏足够的兴趣,更不愿为之枉费过多时间精力。如此,他们便在利益角逐动机的驱动下期待将核心量化指标之外的事务外包给他人代劳。另一方面,在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制度下,大学生习惯于将获取核心量化指标作为终极成长目标,而对于取得这些量化指标的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成长意义则漠不关心。为了能如愿达成目标而又不耗费时间精力,他们选择将行事过程交由他人代劳,自己则坐等收获事务的处理结果。显然,这种去过程化的行为策略不仅压缩了大学生的成长空间,而且也极易逾越伦理道德边界。

(三)时间焦虑引发大学生校园生活的快餐化和内卷化

在如今的加速社会形态下,社会时间逻辑形塑着个体的时间意识和时间感受,并逐渐衍生出一种“自我强制”的时间焦虑感。生活在学校时间体系中的大学生也难以逃脱,不断遭受着“时间暴政”带来的各种冲击与裹挟,从而陷入深深的压迫感和焦虑感之中。于是,他们开启了校园生活加速模式,争相加入生活方式快餐化和竞争秩序内卷化的行列,期待能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所有事务,进而在相互竞争中占得先机。由此,各种省时策略应运而生,校园“代经济”消费便是其中的重要选择。大学生们在成本可接受范围内,竭尽所能地将生活事务交由他人代劳,甚至连一些本应亲身处理的学习任务也外包出去。他们只顾如何方便快捷地按照个人需求高效处理事务,至于由“代劳”导致的成长机会丢失和伦理底线僭越则抛之脑后,对需要长期投入、延迟回报的过程性活动更是缺乏足够的耐心。

(四)过往成长历程造成大学生内心世界的空心化和泛娱乐化

不少大学生自小在家庭和学校“一切为了成绩”的规训

下沿着既定轨迹努力,其成长中缺少足够的劳动锻炼、挫折教育和意义体悟,逐渐生成责任意识淡薄、抗压能力脆弱以及价值意义虚无等精神世界的“空心化”状态。他们很少有自主学习、劳动、实践的机会,更缺乏从这些活动过程中获得精神满足与意义认同的能力,因而将时间精力投向那些能带来“即时满足”、获得心理慰藉的娱乐活动。长此以往,大学生们逐渐对于那些日常琐事或者需要持续付出努力的任务缺乏应有的耐心和兴趣,在面对学习挑战与生活困难时习惯于逃避现实而非主动克服。在此状况下,“代经济”的广泛普及恰恰契合了上述部分大学生的需求,成为他们逃避事务自理责任的强大依靠。同时,在这种“逃避型”心理驱使下,大学生逐渐从“事务的主导者”退化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深陷“主体悬置”的异化状态。

(五)数字生活方式助长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虚拟化与原子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青年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交往模式被深度重构,广泛呈现出强烈的“数字依赖”。大学生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被深深吸附在数字世界里,致使其人际交往方式趋于虚拟化与原子化,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联结不断弱化、情感关系日益浅表化。与此同时,他们在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染下,对人际交往关系的认知出现一定的偏差,错误地将人际交往归于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之中,把人与人的情感联结物化为相互利用。由此而来,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社恐”心态,他们越来越不会、不愿与他人相处,同学间逐渐缺少了分享喜悦和分担困难的温情。这就使得大学生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求助于身边的同学,而是网上下单找人代劳,用购买服务的交易方式替代人际互助模式,在事务处理中尽可能将需要长期维系的情感联结转化为简单直接的消费关系。

四、大学生“代经济”消费异化样态的教育对策

(一)提升劳动素养,引领大学生体悟生活劳动美好意蕴

缺乏劳动素养、曲解劳动价值是大学生厌恶生活劳动、逃避生活劳动,进而过度依赖于“代经济”消费的最直接原因。因此,要加强劳动教育,切实提升大学生劳动素养,尤其需要引领他们深刻感知和体悟生活劳动的美好意蕴,以增强其对生活劳动的积极情感。一方面,要增强大学生对生活劳动的正确价值认知,使他们深刻理解生活劳动对于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而非简单将其视为枯燥乏味、艰辛痛苦的生活负担。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指导大学生从劳动的本质出发,结合当今时代特征,认清大学生只有通过亲身劳动实践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拓展交往、安顿心灵,进而建立与自我、社会、自然的丰富联系。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在真实生活中体悟如今的劳动绝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创造,而更需要超越浅层的世俗价值,并从中塑造品格、蕴育精神、涵养心性,进而获得精神满足和情感愉悦。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澄清劳动并非与休闲对立,而更意味着个体要以精神需求为内核,不断寻求与休闲保持本然统一性的自由劳动。

(二)优化育人目标,注重人才培养的过程性评价

高校要从根本上破解大学生找人代劳学习任务的弊病,应优化育人目标,将教育评价由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一是树立发展性教育理念,将教育评价视野转向学生的成长变化过程。育人活动不能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习得,更应对学习过程充满意义关怀,注重学生在体验性、沉浸性和生成性的教育过程中获得精神领域的系统变化和全面成长。二是关注教育内容的价值性涵养,将评价目标指向知识技能的价值转化和意义创生。改变以往在知识表层符号上的浅尝辄止,转而在更深层次上挖掘、调动教育内容的内生性文化内涵与育人资源,以此促使学生获得精神激励、价值启迪

和情感触动。三是以构建多维“成长画像”为中心,改善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方式。注重通过学生日常表现和核心素养过程性“增值”状况,绘制出各阶段的“成长画像”,以直观呈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达成情况。

(三)优化教育时间机制,重塑大学生自由时间秩序

高校要优化教育时间机制,重塑大学生自由时间秩序,不断消解校园“快餐文化”和“速成文化”。一是优化学校时间制度,调整学校教育的时间结构。完善人才培养目标,统一时间计划安排,避免教育活动的时空压缩和多任务的集中扎堆,进而防止学生被动滑向“代经济”消费异化困境。二是提升大学生自由时间认知水平。既要引导大学生充分理解自由时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积极空间,为科学认识和合理应用当下的有限自由时间奠定思想基础,又要鼓励他们理性审视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时间娱乐化现象,深入剖析娱乐时间、休闲时间与发展时间的区别及联系,遏制校园生活泛娱乐化倾向。三是倡导“慢教育”,促成深度思考。遵循教育规律和个体身心发展特点,引导大学生调适校园生活节奏,摒弃在“快餐文化”中一味追求事务速成,转而在充分的朋辈互动交流、品读诗书经典、倾听师长人生畅谈中积极关怀自我意义、观照生命体验、体会人生幸福和探索创新创造潜力。

(四)推进家校社联动,共育大学生奋斗品格

针对大学生在过往成长经历中形成的精神症候,高校应积极推动家校社协同,构建共育大学生奋斗品格的文化生态。一是联动学生家长,营造勤劳笃行的家庭氛围。要引导家长转变以往的“分数至上”观念,积极鼓励学生不断提升幸福力,以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赢得未来美好生活。二是积极倡导社会相关组织,营造健康向上的成功文化。要在舆论宣传、就业导向、榜样人物选树等方面大力宣扬青年奋斗精神,坚决抵制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形式散播诸如一夜暴富案例、快速成功法则、人生逆袭传奇等扭曲价值观念。三是推动“三全育人”,构建奋斗精神培育生态。要将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新时代好青年作为核心目标,设置全员参与、全方位覆盖以及全过程衔接的清晰定位,充分发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主渠道作用,以易于入心入脑的方式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奋斗幸福观,在自立自强、拼搏奋进中收获更有意义的幸福体验和愉悦享受。

(五)纠正数字沉迷,引导大学生丰富现实人际情感联结

教育工作者应立足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的“线上E人、线下I人”等现实人际疏离状况,帮助大学生摆脱数字沉迷,从虚拟交往走向现实人际互动。一是引导学生形成人际关系与人机关系的正确认知。既要帮助学生廓清人际关系是人本质属性的现实体现,而数字技术及其带来的虚拟世界仅是人的工具;也要向他们澄明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与人机关系相互颠倒的异化影响。二是引导学生实施理性数字断连,努力将更多注意力转移至现实世界。鼓励班团组织开系列“理性断连”公约活动,号召学生理性审视和反思不良数字生活方式,纠正错误用网行为习惯,继而逐步克服数字依赖和数字沉迷,将注意力向现实世界转移。三是引导学生构建现实生活中朋辈间的情感支持系统。帮助学生增强人际交往能力,逐步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社恐”心理。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朋辈互助合作小组、志愿服务队等学生组织,在人际互动中感受同学间的情感温暖,在互助合作中体验获得感和归属感。

参考文献:

[1]李晓嘉.“代经济”的产生原因及未来发展[J].人民论坛,2020(21):42-44.

(下转第52页)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s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comprehensive Education"

ZHU Xiao-xi

(Jiangsu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antong Jiangsu 22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ree-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volving all staff,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 aspec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with both educational value and social governance value. Based on the "three-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ncep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logical connection of integrating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s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analyzes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proces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among all members, poor integration of the entire process, insufficient all-round integration, and incomplete guarantee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to build a "learning and governance community" as the core, and construct a systematic integration path from three dimensions: "all-member collaboration", "entire-process integration", and "all-round integration", aiming to achieve the dual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ree-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 services; community governance; practic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桂杉杉)

(上接第48页)

[2] 洪波. 消费的人学意蕴[J]. 求实, 2013(3): 25-28.

[3] (美)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82-83.

[4] 王小章, 冯婷. 消费的解放与意义的追寻——作为自我实践的消费如何可能[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6): 129-137.

[5] 金卓, 王晶. 论实践的意义维度[J]. 广西社会科学,

2012, (11): 48-50.

[6] 廖新宇. 海德格尔对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化解——基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结构[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0(5): 47-54.

[7] 马雯. 加速的反噬: 现代教育时间的内卷困境及其生成机制[J]. 大学教育科学, 2025(2): 58-67.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Corrective Strategies of Alienation Patterns in College Students' "Proxy Economy" Consumption

LI Guang-ming, DONG Yan-jun

(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While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 a certain degree of "freedom and liberation" through "proxy economy" consumption, they also exhibit numerous alienation patterns in their consumption motives, content, processes, and relations. Exploring the generative logic behind this, it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driving the cognitive value of labor towards utilitarianism and de-signification; bias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ausing developmental goals to continuously narrow and lose their process-oriented nature; time anxiety triggering an increasingly fast-food-style and involuted campus life; past growth experiences resulting in a hollowed-out and pan-entertainment inner world; and digital lifestyles propell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owards virtualization and atomization. Therefore, universities should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measures from various aspects: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life and labor literacy, optimizing process-oriente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s,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time system, promoting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o jointly cultivate students' striving character,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real-world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connections. These actions aim to correct the alienation patterns in college students' "proxy economy" consumption and safeguard their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xy economy;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alienation patterns

(责任编辑:陈思婷)